

近代冀中鄚州镇的定期市

卢忠民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要】鄚州镇定期市兴起于明初,清康熙时期达鼎盛,近代以后总势趋衰。庙会与集市均为该镇的定期市,只是集市开设是以旬为计,而庙会开设则以年为计。鄚州镇定期集市的命运取决于庙会的兴衰,这是其异于冀中他处定期市的独特之处。政府政策的变动是该镇定期市变迁的根本原因。近代鄚州镇交通不畅、周围集镇的勃兴及战乱频仍,也是其变迁的重要因素。对鄚州定期市的研究,为研究近代冀中乃至全国的定期市变迁提供了一独具特色的范例。

【关键词】近代;鄚州镇;定期市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1-0116-13

Periodic Fair of the Modern Maozhou Town of the Mid-Hebei

Lu Zhong-min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eriodic fair of the Maozhou town began to rise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Kangqian period in Qing Dynasty. The particular difference from any other periodic fair of the Mid-Hebei was that it ros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temple fair and fall with the cancelling of the temple fair. The changes of the Maozhou town Periodic fare, the basic reason lay in the greatly change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Maozhou temple fair. Other important reasons were the local poor transportation, the rising of the neighboring commercial towns and the high frequency of wars and chaos. The studying of the Maozhou town periodic fair provided us for a particular and characteristic exemplific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periodic fair of modern Mid-Hebei and the whole China.

Key words: modern age; Maozhou Town; periodic fair

鄚州镇位于冀中平原中部,为畿南重镇,在河北任丘县城北20公里,靠平大(北平至河北大名)公路,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当间;往西3公里是白洋淀,可逆行入府河至保定;北6公里是大清河,可通天津,水陆交通极为方便。鄚州镇在明代以前多为该地的县、州城,政治、军事地位突出,尽管明朝以后废州县治所沦为镇,但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地位总高于县城任丘,并总以城看待。该镇药王庙(扁鹊祠)系明万历帝御敕重修并钦设庙会,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

庙会与集市均为鄚州镇的定期市,只是集市开设以旬计,而庙会开设则以年计。清末到民国前期是华北集市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且集市发展和集镇勃兴同步进行。^①然近代鄚州镇的庙会严重衰落,集市虽仍在当地扮演重要角色,但因受本县及周边县区集镇勃兴的冲击也呈萎缩之势,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沦为本地农村集市,时至今日衰貌依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变迁轨迹如

[收稿日期] 2007-11-08

[作者简介] 卢忠民(1973-),男,河北东光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何?哪些是其变迁的根本原因?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探索冀中乃至华北近代集镇市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各个时期中国各区域定期市的研究成绩显著,^①但多注重宏观及明清时期的研究,对小区域尤其像乡镇定期市的微观研究及近代的定期市集关注较少,其方法多注重大区域内多个集市的集期、集数、密度、结构研究,而未曾见把某镇定期市放到该地区集市的大环境中进行时间及空间的比较研究。下面就从鄚州镇定期市的交易范围、规模、集期频率及市场层级结构的角度,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从中觅其变迁轨迹及原因。

一、鄚州镇集市之结构与交易

“华北各地集镇街市,除去有固定铺面并随时经营的商店之外,普遍都开设有定期集市市场。”^②定期性是华北地区集市交易至今仍保持的一大特色,反映了华北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独特性。冀中任丘县也不例外,据载:“聚村而居,业此不能业彼,日久必患于积滞,是以所立集市以通其有无。城里与各大村皆有之。每旬日虽三五不同,然确定不移,使得届期互易,人日为便。”^③为便于考察,兹将任丘各时期集市集期情况列表(表1)如下:

表1 任丘各时期集市集期(农历)统计表

	明万历年间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1928年前后	
	集市名称	集期	集市名称	集期	集市名称	集期
乡村集市	鄚州	二、八	鄚城市(今鄚州镇)	二、五、八	鄚州镇	二、五、八
	吕公堡	二、七	吕公堡市	二、七	吕公堡镇	二、七
	长丰	三、八	长丰市	三、八	长丰镇	三、八
	梁召	一、六	梁召市	一、六	梁召镇	一、六
	羽林堡(今议论堡)	四、八	羽林堡市(今议论堡)	四、八	羽林堡(今议论堡)	四、八
	石门桥	四、八	石门桥市	三、八	石门桥	三、八
	司马庄	六、十	司马庄市	六、十	未提	
	辛中驿	六、十	新中驿市(今辛中驿)	六、十	辛中驿	五、十
			东大务市	一、六		
			余村落诸小市不及备载		青塔镇	二、五、八
					北瀚村(今北汉)	一、六
					关城村(今属安新县) ⁴	五、十
					赵北口镇(今属雄县)	四、九
					大尚屯(今属大城县)	一、四、七
					大树刘庄	四、九
					陵城 ⁵	五、十

①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集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③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集市一。

续表 1

	明万历年间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1928年前后	
	集市名称	集期	集市名称	集期	集市名称	集期
县城集市	迎恩	逢三	迎恩市	逢三	任邱城里	一、三、五、七、九
	崇恩	十七、二十七	崇恩市	十七、二十七		
	兴市	逢九	兴市市	逢九		
	长春	五、二十五	长春市	五、二十五		
	至善	逢十一	至善市	逢十一		
	西梁	一、二十一	西梁市	一、二十一		
	先春	七、十五	先春市	七、十五		
集市总数	9		10		15	

资料来源：万历《任邱县志》、乾隆《任邱县志》、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孙杰主编：《任丘市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444 页，民国《河北通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67 页。

说 明：1.a、f 二集《任邱乡土地理》上无记载，而民国《河北通志稿》有记载，故按《河北通志稿》为准。

2.b 石门桥镇集期据民国《河北通志稿》记载是农历三、七、十，而《任邱乡土地理》记载是农历三、八，且自建国至今皆为农历三、八，所以本表以农历三、八为准。

3.c 青塔镇集期据民国《河北通志稿》记载是农历逢三、五、八，而《任邱乡土地理》记载是农历二、五、八。另据王英才：《十二烈士考》（《任丘文史资料》第 3 辑 1990 年，第 85 页）中所载亦为农历二、五、八，且目前青塔集日仍为二、五、八。所以本表以农历二、五、八为准。

4.d、e 二集，民国《河北通志稿》无记载，而《任邱乡土地理》有记载，故按《任邱乡土地理》为准。

5. 因县城本身就是一个大镇或普通镇，为考察便，故把县城也计入集市的总数之内。县城往往并存多个集市，为考察便，故把县城作为一个集市对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皆以此为准。

由表 1 知，为了便于村民赶集，任丘县临近各集在集期的安排上多彼此错开互不叠重。从翰香、许檀、龚关等皆持此观点。20 世纪 30 年代杨庆堃通过对山东邹平的集市调查也认为：“临近各集的集期是各不相同的，以免冲突。”^① 任丘县各集集期以每旬两集为主，按每旬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来排列邻近各集集期。

由于相邻各集的集期一般相互错开，因而在一县之内往往每天都有几个集市同时开市（见表 2）。

表 2 民国时期任丘及冀中部分县区集市开市日期统计表

县别	集数	一旬之中每天开市集数										合计	平均每天开集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任丘	前清	10	3	2	3	1	2	4	2	4	1	2	2.4
	民国	15	4	3	3	4	6	2	3	5	3	3	3.6
	雄县	9	5	1	5	3	3	5	2	4	3	3	3.4
	文安	14	3	2	4	3	4	3	2	5	4	3	3.3
	河间	33	8	6	8	6	9	7	7	8	6	9	7.4
	固安	19	5	3	6	7	6	6	3	5	8	6	5.5
	霸县	12	3	1	2	2	2	3	1	2	2	2	2.0
	清苑	62	14	13	12	17	12	15	11	12	18	11	13.5
	合计	164	42	29	40	42	42	41	29	41	44	37	38.7
	县均数	23.4	6	4.1	5.7	6	6	5.9	4.1	5.9	6.3	5.3	5.5

① 杨庆堃：《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大公报》1933 年 7 月 8 日。

资料来源：任丘集数参见表 1。民国《雄县新志》、民国《文安县志》、民国《霸县新志》、民国《固安县志》、民国《清苑县志》、河间集数见《河北通志稿》，第 1865—1866 页。

说 明：1. 合计、县均数未包括清前期任丘县的数据。

2. 民国《清苑县志》卷 1《地理·市集》中记载魏村集期为三、六日，而康熙《清苑县志》与《河北通志稿》（第 1870 页）中皆记载该集集期为三、八日，所以，我们采用三、八日。

表 2 显示，各县不管集之多少，每天所开集数多接近于平均数，这既能看出人们安排集期之巧妙，亦给人们提供交易之便。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市间隔较大之不便”，^①这样“人们有需要就可一天赶一集，这对于游行商人又很便利，他们可以一天赶一集”。^② 龚关认为“不论是集市数较少的县，还是较多的县，每天所开集市之数都接近于平均数”，^③ 此结论未免有些武断，如任丘县在清中叶逢四、逢九集，一旬之中每天开集数仅为 1，平均每天开集数是它的 2.4 倍；民国时期逢五集，一旬之中每天开集数为 6，是平均每天开集数的 1.7 倍。又如雄县民国时期逢 2 集，一旬之中每天开集数仅为 1，平均每天开集数是它的 3.4 倍。这说明有些集市每天开集数与平均数有较大差距，而非都接近于平均数。

按时间坐标看，清代前期，任丘平均每天开集数为 2.4，而民国时期升为 3.6，民国时期是清前期的 1.5 倍，说明民国时期随着当地集市数量的增加，人们赶集的选择机会比清前期多了。就鄚州而言，该镇集期与后起部分集市集期重叠的情况较明清时多，如逢五集，康乾时只县城一处与鄚州集期重，而清末民国时有青塔、辛中驿、关城、陵城、县城五处与鄚州集期重，这意味着以前于初五、十五、二十五去鄚州赶集的村民，这时如无特别需要，多就近上集贸易，无需舍近求远去鄚州了。一般情况下，平均每天开集数越多，在集市密度、全县人口一定的情况下，附近居民对集市的选择余地越大，使得某些集市上市人数可能越少，相反可能使另外一些集市规模扩大。如任丘青塔镇棉纺发达，在 1920—1924 年间，仅在青塔镇的高阳布线庄支店就有 8 个，拥有散机 1726 台，出布总数 195000 匹，消费棉纱量 4875 包。^④ 由于青塔镇与鄚州镇集期重叠，皆二、五、八，以前赴鄚州赶集的客商，随着青塔集市的崛起，如今可能转道青塔，这无论如何也当影响鄚州镇的集市贸易规模，至少在棉布市场方面。

按空间坐标看，民国时期任丘平均每天开集数为 3.6，明显低于固安的 1.5 倍、河间 2.1 倍、清苑 3.8 倍及冀中几县的平均数的 1.5 倍，同时与雄县、文安等县大体持平，说明周边诸县大多在民国时期随着集市数量的增加，其每天开集数多高于任丘县或与之持平，这意味着以前可能来任丘县赶集的周边各县村民，如无特殊需求，可能在所在县区就近上市而无需来任丘县贸易了。这样，民国时期任丘县集市贸易整体处于一个让周边县区冷落或遗弃的命运之中。任丘县整体贸易环境的不利，也相应或多或少地要影响鄚州集市规模及在周边县区集市中的地位与影响。

从集市的开市频率看，冀中各县与华北地区一样，基本上呈现每日集、隔日集、十日四集、十日三集及五日一集并存的格局，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 3）。

① 许 檬：《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杨庆堃：《一个农村市集调查的尝试》，《大公报》1933 年 7 月 8 日。

③ 龚 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④ 厉 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3 期。

表 3

民国任丘及周边县区集市开市频率统计表

	总集数	每旬 2 集		每旬 3 集		每旬 4 集		每旬 5 集		每旬 6 集		每日集	
		集数	占总集数%	集数	占总集数%								
任前清	10	8	80	1	10			1	10				
丘民国	15	11	73.3	3	20.0			1	6.7				
雄县	9	2	22.2			6	66.7			1	11.1		
文安	14	11	78.6	2	14.3			1	7.1				
河间	33	32	97									1	3
固安	19	8	42.1	1	5.3	9	47.4						
霸县	12	8	66.7			1	8.3						
清苑	62	57	92	3	4.8	1	1.6					1	1.6
合计	164	129		9	5.5	17	10.4	2	1.2	1	0.6	1	0.6
平均	23	18		1.3		2.4		0.3		0.1		0.1	
河北省	780	620	79.49	28	3.59	82	10.51	45	5.77			5	0.64

资料来源:1.任丘集数参见表 1。民国《雄县新志》、民国《文安县志》、民国《霸县新志》、民国《固安县志》、民国《清苑县志》、河间集数见《河北通志稿》,第 1865—1866 页。

2.河北省的数据参照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石源润:《明、清、民国时代河北省的定期市》,《地理学评论》,1973 年第 46 卷第 4 期。

说 明:合计未包括清代前期任丘县数据。

表 3 显示,近代任丘、冀中及河北的每旬五集、六集及每日集(常集或常市)很少,不存在每旬一集的情况,多以每旬两集即五日一集为主,如河间每旬两集的集数占其总集数的 97%,清苑、任丘、文安、霸县及冀中的平均数皆在 66% 以上。一般讲,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大指标,“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集市的交易频度”,^①“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②但也不尽然,因为集市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影响集市开市频率的因素一般有市场交易规模、自然地理条件、人口规模、风俗习惯以及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等。正是由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造成了各地集市开市频率的复杂性。^③所以不能勉强说,集期的疏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关系,即开市频度高的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定高。如雄县,以每旬 4 集为主,占总集数的 66.7%。由于“雄邑土壤褊小,谷物之外,出境之货甚少”,^④商品化程度低,所以使得雄县集数少,而集期频率高,集市的开市高频率弥补了集市的低数目,这正符合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反,任丘由于“日益增长的交易需要不是通过增加集市的集期频率,而是通过开设新的集市来满足”^⑤,所以集数多,而集期频率低,集市空间分布密集则又弥补了开市频率低的不足。任丘每旬 3 集的集数占总集数的 20%,而河北省只占 3.59%、冀中只占 5.5%,任丘是河北省的 4 倍强、是冀中的 3.6 倍,说明任丘在集期安排方面较河北省、冀中平均水平高。

①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第 29 页。

② 许 檬:《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③ 龚 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④ 民国《雄县新志》建置篇,成文出版社 1969 年影印本。

⑤ 龚 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鄚州在明朝集期是每旬二集,到清康乾时增为每旬三集,集期的增加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及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相适应,以前的集期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村民生活生产需求,所以随着康乾盛世时社会经济和商品化的大发展,市场交易规模因之扩大,人们对交易的需求更经常化,鄚州集期也相应增加,与县城(每旬五集)皆占当时集市总数的10%,而每旬二集的集市占总集数的80%,说明鄚州在集期开市频率方面,仅次于县城,占相当优势。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①所以鄚州镇集市在康乾时期达到鼎盛。然自清中期至民国,鄚州集期依旧,未增亦未减,这可能是依当地习俗,集期一般不易增减所致。但清末民国时期青塔、大尚屯作为后立之集,集期皆为每旬三集,分别是二、五、八和一、四、七,显然,集期的确立并不以风俗为主,经济发展及商品化程度当为主要因素。这时,任丘县开市频率为每旬三集的集市从清中期的10%升至20%,而每旬两集的集市从清中期的80%降至73.3%,这说明鄚州在集期开市频率方面优势下降。同时随着鄚州周边雄县、固安每旬四集、六集及河间、清苑每日集的出现及增多,其在开市频率方面的劣势愈来愈明显,从而使得鄚州定期市集的实际效率也愈显低落,必然使其自身规模较明清缩小,从而看出其在近代有趋衰之势。

二、鄚州镇庙会之结构与交易

(一)庙会期限

庙会作为集镇市场的一种贸易渠道,亦有定期,称庙市,以年为周期举办。许多庙会一年只开一次,多者不过数次,间隔期长于市集。近代任丘“城关以及各镇堡,每岁皆有庙会一二次”^②,其中鄚州庙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每年四月大会,各省商贾云集,人烟稠密,香火隆盛”,^③对本地、冀中及华北地区的影响也最大。表4是对鄚州庙会会期的统计。

近代鄚州庙会会期(农历)统计表					
清末至民国前期		民国中期(七七事变前)		建国前	
庙会地点	庙会期限	庙会地点	庙会期限	庙会地点	庙会期限
北大庙(药王庙)	四月全月	北大庙(药王庙)	四月十五~二十五日		
开元寺	九月二十二~二十五日				四月一~十日
龙王庙	二月二~五日		九月二十二~二十五日		
刘守真庙	三月十五~十八日	开元寺		鄚州城里	
合计(天)	42		15		10
百分比	100		35.7		23.8

资料来源: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五(专为奉神而设者未载),刘崑源手抄本,任丘市马合意藏;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45页;李增琦:《鄚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说 明:1.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时期鄚州镇药王庙庙会期,据乾隆《任邱县志》卷2《建置志》载为四月一个月。另据王英才:《鄚州三宗宝》(李据主编:《任丘史话》,沧州出版社1992年第102号,第54页。)载:“鄚州的庙多,总数约三百余处。”这些庙中哪些设有庙会,无资料可查。所以我们研究鄚州镇庙会会期只着眼于近代,暂不与近代以前的作比较。

2.尽管当地人习惯上称鄚州庙会为药王庙会,但明清至民国时期,鄚州实际上并非只药王庙会一个,还有其它一些庙会,只是因这些庙会持续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一般被人们所忽视。不过,谈鄚州庙会的会期,我们应包括这些庙会的会期。

① 许 檬:《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五,刘崑源手抄本,任丘市马合意藏。

③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一。

从持续时间上看,表4显示,清末至民国前期,鄚州庙会会期持续共计42天,民国中期(七七事变前)15天,建国前10天,七七事变前仅为清末的35.7%,建国前仅为清末及民国前期的23.8%,依次递减。一般来讲,庙会持续时间越长,其交易量越大,交易范围也越广,庙会规模也就越大,反之则否。因此,近代鄚州镇庙期的依次递减直接导致庙会规模的逐渐缩小。

(二)庙会交易范围、规模

庙会多设在春秋农闲季节,因会期时日较长,交易范围、规模远比一般集市为大。庙会的交易范围,可达方圆几百公里,三、五个县或更大些,甚至远近数省;其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商品数量、品种及交易量皆远远超过集市。鄚州药王庙会是明清以来波及数省、远近闻名的大型庙会,鄚州也就成为跨省际具有批发集散性的中心集镇市场。

明中后期,鄚州庙会的交易范围遍及北方大部分省区,如“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①清康乾时期,鄚州庙会交易范围不仅覆盖冀中区,如鄚州北40公里的霸州居民“结礼聚镪,驾舟以往,三日始返”,^②而且较明代进一步扩大,遍及江浙、两广云贵、东北、西北、华北各地。^③及至近代,尽管鄚州每年阴历四月庙会仍是商货云集,^④但由于近代战乱频仍,交通时有断阻,对远方商贾来此贸易无疑要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鄚州庙会的交易范围较明清甚为减缩。

鄚州庙会康熙年间规模最大,“庙会之时,诸货鳞集,祈福报愿,摩肩接踵”^⑤。单强认为,庙会之所以吸引远近居民,并不是靠其空泛的宗教,而是祭祀的仪式借用了生动具体的娱乐手段,从而把更大范围的购买力聚拢起来,使商人成市有利可图。^⑥就鄚州药王庙会来说,吸引远近村民及客商的主要还是属于道教的药王扁鹊。封建时代,医学落后,民众普遍贫困,面对各种疾病往往束手无策,无奈之时只能求拜神医保佑,故乡在鄚州、能医百病的扁鹊即是人们所信奉的神医之一。不用说庙会之日,就是平日,“四方之人,遇病来祷者殆无虚日,靡不辄获瘳愈”,所以“每岁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天下被其阴德者,各致虔诚而来报祀,肩摩踵接”^⑦,即使无病的村民也想趁药王生日之时来此祈福以保身康体健,多繁忙的客商也要抽暇到庙前一拜以求生意兴隆,平安返乡。当然人们除买些烧纸烛香之外,回家时也会买些新鲜或平常在集市买不到的商品。庙会规模因而盛大空前。当时鄚州城内,设有三街六市(即中和街、广益街、兴隆街;布线市、百艺市、骡马市、南货市、珠宝市、药材市),^⑧城西0.5公里是赛马场,西北角是大型骡马市,城北则是群艺聚集之处,直至北大庙,庙会期间总是人山人海,^⑨“芦棚不见天日”^⑩。

及至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政府力倡破除迷信,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这对靠神医吸引远近客商的鄚州庙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打击,交易规模逐渐缩小。据民国《任邱乡土地理》载:鄚州民困无处筹钱,以至“重修庙宇不及,街衢以客货无著,遂改移鄚州街内”,因而“商贾交易,届时皆鳞集于鄚州。”^⑪这表明,当时不仅鄚州至大庙沿路两旁已无临时商铺,而且因庙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外郡·鄚州》,第616页。

^② 康熙《霸州志》卷1《舆地志·风俗》。

^③ 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45页。

^④ 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

^⑤ 康熙《重修任邱县志》卷3《祀典》。

^⑥ 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⑦ 康熙《重修任邱县志》卷4《艺文志》。

^⑧ 《鄚州城及鄚州大庙平面图》,任丘市王传玉先生藏。

^⑨ 王英才等:《鄚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2002年第2次印刷,第62页。

^⑩ [清]高士奇:《南行扈从录》,转引自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45页。

^⑪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一。

破庙前亦无商摊,所有交易皆集于鄚州城内,鉴于城内交易空间有限,所以交易规模定较康熙时期大大缩小。下面表5就印证了这一点。

表5

鄚州各时期座商户数对照表

时期	座商(户)	指数(七七事变前为100)
康熙年间	至少170	116
道光二十四年(1844)	17	12
七七事变前几年	147	100
七七事变后	65	44

资料来源:康熙年间资料参见上面的推算。《任丘县城镇半年来工商业变化情况总结》,1949年8月27日,任丘市档案馆:1-1-40。

表5显示,就鄚州镇各时期座商指数而言,康熙时最高,道光时最低,前者是后者的9倍强,事变前、后分别较康熙时下降了至少14%、62%。其发展趋势时减时增,多有反复,但与康熙时相比,总趋势无疑是下降的。

(三)庙会的上市货品种类

庙会由于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所以届时上市商品种类齐全,数量庞大,有的庙会还形成了商品专业市场。鄚州庙会于康熙年间就已形成大宗商品的专业市场,以后各时期皆然,不过专业市场的个数各时期有增有减(见表6)。

表6

鄚州镇各时期专业市场分类统计表

时期	康熙年间	清末至七七事变前	1947年5月
市 场 名 称	布线市	粮市	粮食市
	骡马市	布市	土布市
	药材市	骡马市	牲口市
	南货市	药市	棉花市
	珠宝市	夏货市	花生市
	百艺市	皮货市	
	共6市	山货市	
合计		共7市	共5市

资料来源:《鄚州大庙平面图》,《任丘文史资料》编委王传玉藏。李增琦:《鄚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245页。

表6显示,鄚州庙会各时期皆有布线、牲口(骡马等)二市,说明该镇庙会或集市有满足地方性生活、生产需求之基本功能。康熙时鄚州共有6个专业市场,除上述各时期共有的二市场外,还有珠宝、南货(南方诸省运来的商品,北方没有)、药材三市属高、中档消费品市场,用以满足富贵之家较高层次及富裕农民婚丧嫁娶、年节、治病保健等消费需求,省际商品集散功能较强。不过,这些市场一般面向普通百姓的较少。另外还有专供娱乐消遣的专业市场,如百艺市(戏班等),在此百姓可免费观看,每逢庙会这里最热闹。^①可见这时庙会的商贸、娱乐功能均较强。清末至民国前期共有7个专业市场,较之康熙时增加了粮食市,且以“粮市,牲口市并盛”,^②说明鄚州市场分类越来越细,日益面向本地大众的生活消费及生产需求,地方性功能增强。其间虽也有高、中档商品,如皮货、山货、夏货(系康熙时南货市场的一部分)市等,不过,因这时比康熙时少了交易额巨大的珠宝市,说明此时庙会的跨省区性商品集散功能有所减弱,尤其是集散特贵重商品的功能有所弱化。同时庙会期间尽管也有娱乐演出,如

① 张恩惠老人2004年3月5日上午口述。张恩惠,鄚州镇古州村人,69岁,鄚州大庙工作人员。

② 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2卷第2期,民国1934年2月。

昆腔、龙灯、高跷、大鼓书等,^①但随着娱乐专业市场(百艺市)的消失,庙会使人借以倾心消遣娱乐的功能也当有所减弱。但娱乐、商贸功能弱化幅度并不大。可经过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浩劫,到1947年鄚州镇只有5个专业市场,且上市商品皆为牲畜及本地农副产品,南方特产及高档商品消失,庙会的地方性商品集散功能进一步增强,但跨省区商品集散功能大大弱化,远不如事变前,更不如康熙年间。

三、集市的层级结构

研究集市层级结构,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认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市场应吸附周围18个村庄,约1500农户,同时,对居民最方便、最省时省力,而对于商业网点可能获利最大、耗费最小的商业服务区呈正六边形。施氏据此将中国的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并认为中国的县城大都是中心市场,镇是中间市场,农村集市是基层市场。^②但施氏的研究过于模式化,其六边形市场的说法在华北及江南地区就难以得到充分印证。^③王庆成先生对施氏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更进一步的质疑。^④同时,史建云也对施坚雅市场理论就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市场社区理论等提出了若干思考。^⑤事实上,施氏的市场理论在冀中也很难得到证实,至少是在任丘县。

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反方向变化”,是“显著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即人口密度越小,基层市场平均面积就越大,而市场服务人口也就越少;反之,就向相反方向变化。^⑥王庆成先生将这一理论加上关于每一集市平均18个村庄左右之说简称为“施氏公式”。王先生认为不仅集村比率符合18个村庄左右之说不成立,且“按人口密度的等差而考察集市面积、市场人口,几乎与施氏公式完全不一致,符合者极少。”^⑦“施氏公式”证之于冀中区亦难成立,不妨顺王庆成先生的思路将民国时期冀中区部分州县的集村比率和人口密度、市场面积、市场人口等实况与“施氏公式”做一对照(表7)。

表7 “施氏公式”与民国时期冀中集市实况对照表

州 县	集村比率	人口密度	市场面积	市场人口
施氏公式	18左右	175—200	46—41.2	8050—8240
任丘	21.7	184.7	93.6	17288
施氏公式	18左右	200—225	41.2—37.1	8240—8350
大城	27.3	214.2	60.8	13014
施氏公式	18左右	250—275	34.3—31.7	8570—8720
固安	22.1	266.3	38.6	10286
河间	19.4	269.6	42.7	11503
施氏公式	18左右	335—350	27.3—25.1	8870—8790
霸县	21.3	347	36.4	12638
雄县	33.1	329.2	35.9	11813
清苑	6.5	336.6	16.8	5652

① 李增琦:《鄚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246页。

②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8、21—40页。

③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第42页。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

④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⑤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1—43页。

⑦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资料来源：民国《任邱县全图》，1929年2月任丘县政府制，集数见《任邱乡土地理》及《河北通志稿》。民国《雄县新志》。河间：民国集数见《河北通志稿》，面积、人口见《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大城，1995年《大城县志》，面积见《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民国《霸县新志》。固安，民国土地面积、人口据《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集数参见1942年《固安县志》。清苑，民国《清苑县志》，面积见《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1—43页。

说明：各县土地面积笔者将其由平方市里换算为平方公里。

在上表7县的对照中，集村比率大致符合18左右者只河间1县；而按人口密度的等差来考察集市市场面积、市场人口，与施氏公式则完全不一致，甚至相差很远。每市场平均面积最大的是任丘县，达93.6平方公里，照施氏公式，那里的人口密度应为每平方公里60~70人，而实际上任丘县集市的人口密度高达184.7人，与公式相距甚大。上列7县中市场面积最小者是清苑，只16.8平方公里，照公式它们的人口密度应最高，在450~500之间；而实际上，清苑人口密度为336.6。所以我们认为“施氏公式”，与实际大不相符。

那么，任丘县的市场层级结构是否也呈正六边形模式呢？近代任丘的集市商业状况，据民国《任邱乡土地理》载：“吾邑商业向以鄚州为最，以市面资财丰厚，……任邱次之，余如大尚屯、长丰、梁召、吕公堡、羽林堡、青塔、北翰、赵北口、石门桥又次之。”^①据此并依当地传统，我们将任丘县集市也分三个层级：大集、中集、小集。^②显然，鄚州属大集，即施氏所指的中心市场；任丘县城是中集，即中间市场；赵北口、长丰等9集是小集，即基层市场。照施氏理论，中心市场大都是县城，周围应有六个中间市场，且成六边形分布，^③而任丘县的中心市场不是县城任丘而是鄚州镇，位于全县西北角，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且只吸附了一个中间市场，无法构成六边形区域，看来施氏理论在任丘县不可能得到证明了。当然，施氏正六边形市场结构只是一种模型，在其研究时可能从未想过此模型要适合于全中国的各个地区，我们莫过份苛求。

不过，仅据商业规模来划分市场层级未免欠妥。关于集市的区分标准，冀中一些地方志书有所说明。民国《雄县新志》法制略《建置篇·集市》：“雄邑土壤褊小，谷物之外，出境之货甚少，约而计之，不出九类，今定九类具备者为大市，仅备谷物者为小市，余为中市。”民国《固安县志》卷1《地理·疆域》：“境内集市向有三大、五中、八小镇之称，大中镇有牲畜市，小镇无。”当今学者认为，“商品种类的丰盈与否，可以作为大小集最主要的分界”^④，大集竟日成市，小集过午即散。^⑤总之，“不同等级集市的经济量有别”。^⑥

我们不妨按集市的经济含量来分级。近代任丘“城关及各镇堡皆以本地之商贾供本地之人购求，殆无远处之贸易家也。货物之销售，不如鄚州远甚”，^⑦而鄚州为“巨镇”，^⑧“居民三千，商业冠全县，粮市，牲口市并盛。”^⑨不仅如此，就连相邻的雄县、文安县的一些村民也来鄚州交易，如雄县“东南乡则分赴文安县及任邱之鄚州镇交易。”^⑩雄县各集市、庙会贵重商品也多发自鄚州。^⑪可见鄚州当时是地

①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商业一。

② 《任邱县集市交易状况统计表》，1949年5月17日，任丘市档案馆：1-1-40。

③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3页。

④ 徐 浩：《清代华北的农村市场》，《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

⑤ 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⑥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五。

⑧ 《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1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1924年6月。

⑨ 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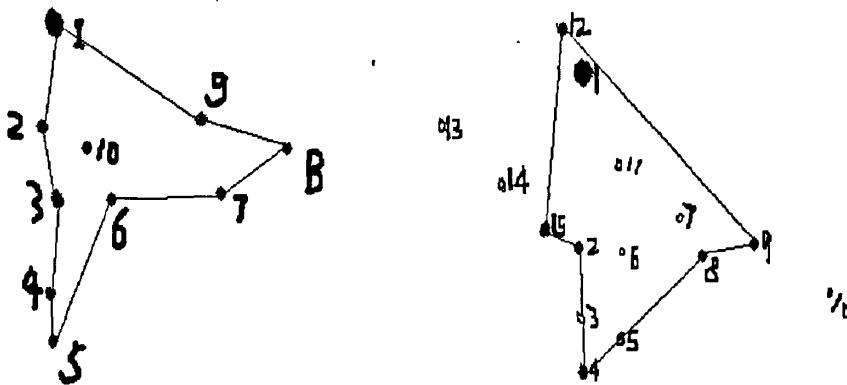
⑩ 光绪《雄县乡土志》商务第十五，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⑪ 民国《雄县新志》商务篇。

区域性集散批发中心市场,远胜于县城任丘及其它各镇,经济含量最高。所以我们可以说鄚州是地区性大集即中心市场。

县城任丘商业规模次于鄚州居全县第二,且“省道……津保汽车道……均以任邱为中心”,^①故把县城划为中集即中间市场当不为过。其它集市哪些是中间市场,哪些是基层市场呢?鉴于近代任丘县未修志书,可查资料甚少,所以我们只好根据在建置上是否为镇作为划分标准,凡镇上之集(鄚州除外)则为中间市场,其余集市为基层市场。因为镇“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市,在近代中国,集市的常住人口一般也都在1000人以上。”^②“赵北口镇,在鄚州北十五里,当西淀东口,亦为大镇。此外县东之长丰镇,公堡镇,新中驿镇。县西之青塔镇,皆千家以上之集镇。”^③这五个集镇虽无商业记载,但从户数方面考虑,亦应列为中间市场,因为户数多,消费多,自然集镇的经济含量就高一些。这样,中间市场即中集包括赵北口镇、长丰镇、吕公堡镇、新中驿镇、青塔镇,加之县城任丘共6个。任丘县其余8个集市皆为基层市场。

这六个中间市场从数目上看确实如施氏所说正好相等,但是否真正符合施氏所说的正六边形模式呢?以下是鄚州与其下一级集镇的市场空间分布图。为便于研究,我们暂不考虑邻县与鄚州镇的市场关系。



资料来源:参照表1。

说 明:1.左图是乾隆年间任丘县集市空间分布图,1—鄚州、2—司马庄、3—任丘、4—石门桥、5—辛中驿、6—议堡、7—吕公堡、8—长丰、9—梁召、10—东大务。据乾隆《任邱县志》载:“以上诸市在各镇,余村落诸小市,不及备载。”由此并参照第二部分可知,鄚州是中心市场,其余9个为中间市场,基层市场未列入。

2.右图是民国时期任丘县集市空间分布图,1—鄚州、2—任丘、3—石门桥、4—辛中驿、5—北瀚、6—羽林堡、7—梁召、8—吕公堡、9—长丰、10—大尚屯、11—陵城、12—赵北口、13—关城、14—大树刘、15—青塔。其中大黑点代表鄚州是中心市场;小黑点代表县城是中间市场;小圆圈代表各基层市场。

上图显示,作为中心市场的鄚州镇在乾隆时期位于一不规则近似五边形的顶点处,位置并不居中,按施氏的研究,这不仅对居民最费时费力,而且也可能使商人获利最少、耗费最多,因此这是最不经济合理的市场结构。然而,鄚州集镇市场在此时期却商贾辐辏,兴旺发达。民国时期鄚州周围的中间市场近似一不规则的六边形,鄚州位于这一六边形的上顶点附近。照施氏理论,鄚州作为当地中心市场,也应有六个基层市场,可在上图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6个。这样,无论是中间市场还是基层市场,

① 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

②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③ 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2卷第2期,1934年2月。

皆构不成正六边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论冀中还是全国集市层级结构,皆无固定模型,各地因其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政治、风俗、文化、宗教环境各异,各自有其具体而真实的市场结构。

四、定期市趋衰之原因

促使近代鄚州镇定期集市嬗变的动因,须从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合力中去探求。

近代鄚州庙会的衰落,引起定期集市的趋衰。

庙会是鄚州镇市场的支柱。鄚州庙会的交易范围从明代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扩大到康熙时期的川、广、云、贵、湖广、江浙、江南及东北、内蒙等地;而定期集市只限于鄚州周边数十里之内。每年鄚州庙会的持续天数,自二月初至五月中下旬再加上开元寺九月庙会,共约 120 天;而鄚州集市频率为每旬三集,一年才 108 个集日。康熙时鄚州庙会的坐贾行商最保守的数字估计也不下 3792 家;^①而定期集市因交易仅限于城内及城门外附近,虽无法考证交易规模,但估计要小得多。所以从交易地域范围、全年开设总天数及交易规模看,鄚州镇庙会确是当地市场的支柱,庙会的衰落必然引起定期集市的衰落。

晚清、民国政府对鄚州大庙、庙会的政策与明、前清相比,成强烈反差。明、前清两朝历代皇帝、政府大多扶植庙会,这是鄚州庙会得以勃兴的根本前提。如万历皇帝对庙会的倾斜政策有碑文为证:^②

万历《御制重修鄚州药王庙碑》云:“……鄚州药王庙者,相传为扁鹊庙,其来若干年。……而基址瘠狭,椽栋颓落,像设弗严,蒿裸无所,……朕乃顺民所欲,出供奉羨金,新而广之。……圣母及朕躬庶几无疾,……庙以万历十二年三月始,迄五月毕工。”

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庙毁于火,^③之后,乾隆发帑银重建。^④由于皇帝出资修缮,方使鄚州药王庙“人烟辐辏,遭回禄而庙貌屡新”。^⑤可见,政府的支持是保障鄚州大庙“庙貌屡新”、庙会正常进行的根本条件。然道光十三年(1833)、十四年(1834)鄚州大庙连毁于火,此时御史刘谊奏请严禁越境烧香,否则“即将为首之人严拿究办”。^⑥随后,鄚州庙会被取消。清末民初任丘政府破迷信、拆庙宇,鄚州庙十大名医塑像被全部拉倒,在百姓请求下,只把扁鹊塑像保留下来。^⑦前后政策的巨变,促使鄚州庙会趋于衰落,从而使得集市贸易随之受到重大影响。

近代鄚州镇交通不畅。鄚州镇,居水陆要冲,自战国至清初向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赵王河改道、京汉、津浦铁路通车、京德古御路破烂不堪等原因,^⑧近代鄚州镇交通遂落后于时代,从而影响了该镇集市的发展。

近代鄚州周围工商集镇的兴起,严重威胁着该镇定期市的发展。近代鄚州“无特别制造之大宗,不过自天津贩各色货物以供本地之用已耳,发客交际,盖鲜闻焉。外运之货,则以麦布为大宗,然亦视岁

^① 见拙文:《明清至民国时期任丘鄚州镇庙会变迁初探》,《古今农业》2006 年第 1 期。

^② 王英才等:《鄚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8 年,2002 年,第 67—71 页。

^③ 道光《任邱续志》卷下《绪言志·余录》。

^④ 王英才等:《鄚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8 年,2002 年,第 60 页。

^⑤ 光绪《重修药王庙碑记》。

^⑥ 光绪《畿辅通志》第 1 册卷 5《帝制纪·诏谕五》,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⑦ 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 205、215 页。

^⑧ 见拙文:《明清至民国时期任丘鄚州镇庙会变迁初探》,《古今农业》2006 年第 1 期。

丰欠为增减。”^① 郑州无自己特色工矿业，自身经济发展的落后，也是其落伍的一大因素。相反，一些周边集镇由于开发利用了某种手工业的资源或技术优势，一举成为该镇及环镇乡村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骨干行业而驰名远近，如宝坻县新集镇、香河县渠口镇、任丘县青塔镇等。彼兴而此衰，郑州镇的商业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近代战乱频繁。如八国联军侵华，郑州受兵灾较重，像天津杨家开的中通当铺被抢^② 等例，不胜枚举。战乱不仅直接冲击集市，使之不能正常进行，更甚者是破坏生产，使经济发展停滞下来，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更严重地影响集市贸易的发展。人为破坏，使郑州镇市场贸易举步维艰。

近代任丘自然灾害频繁。郑州西靠白洋淀千里堤，属“郑州向斜，亦称任西洼槽”，^③ 地势低洼，常溃堤决口，洪灾严重，“一遇河涨漫则顿成泽国”^④，而晚清、民国各级政府腐败无能，面对内外忧患，自顾不暇，致修堤固防无人问津，这也对郑州集市的正常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五、结语

市场犹如经济活动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较真实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状况。近代郑州定期市随时事变化而有变迁，时兴时衰，多有反复，但与明清时期相比，总势趋衰。同时因其随庙会之设而兴，亦随庙会之停而衰，庙会是郑州集市兴衰的晴雨表，这是它有别于冀中他处集市贸易的独特之处。对近代郑州定期市集变迁的研究，可望对当今冀中集镇市场的发展、农村集镇现代化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 [1] 龚 关. 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J]. 近代史研究, 2001, (1).
- [2]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许 檬.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 (2).
- [4] 单 强. 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J]. 近代史研究, 1998, (6).
- [5] 许 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3).
- [6] 龚 关.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其分析[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3).
- [7] 慈鸿飞. 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2).
- [8] 王庆成. 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J]. 近代史研究, 2004, (4).
- [9] 史建云. 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 近代史研究, 2004, (4).
- [10] 卢忠民. 明清至民国时期任丘郑州镇庙会变迁初探[J]. 古今农业, 2006, (1).

①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商业二。

② 姜吉恒等:《郑州史话》,《河北文史资料》第21辑1987年,第194页。

③ 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95页。

④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土脉二。